

專輯論文

# 網絡新聞文本公共商議性研究 —— 以新冠疫情初期中國大陸相關報導為例

章平、楊肖光、戴笑凡、曾詠祺、洪子陽

## 摘要

本文以中國大陸新冠疫苗報導為研究對象，探索性地對網絡新聞文本是否具有商議特性進行總體性考察。採取混合研究法，以計算社會科學中的主題模型為主要方法，同時對重點文本進行深入人工解讀。研究結果顯示：(1) 從包容性角度，較為完整地呈現了新冠疫苗問題的複雜維度和發展脈絡。但同時大量表揚性、同質性文本被廣泛傳播，損害了文本的多樣性。(2) 從互動性角度，商業門戶網站承擔著信

章平，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政治傳播、新聞大數據、影像與當代社會。電郵：[pingzhang@fudan.edu.cn](mailto:pingzhang@fudan.edu.cn)

楊肖光(通訊作者)，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醫院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研究興趣：衛生政策、衛生信息。電郵：[yang\\_xg@sjtu.edu.cn](mailto:yang_xg@sjtu.edu.cn)

戴笑凡，上海市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四級主任科員。研究興趣：新聞傳播。電郵：[1501269201@qq.com](mailto:1501269201@qq.com)

曾詠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政治傳播。電郵：[21210130090@fudan.edu.cn](mailto:21210130090@fudan.edu.cn)

洪子陽，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統計學系本科生。研究興趣：博弈論、大數據研究。電郵：[zyhong@ucdavis.edu](mailto:zyhong@ucdavis.edu)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息擴散角色，但大量宣傳性報導充斥其間。普通民眾與其他四類主體在議題關注和文本框架上形成較大反差，形成「傳播力度強但對話性薄弱」之特點。(3) 從理性角度，文本情感充沛、情感兩極分化嚴重，形成「對外批評對內謳歌」之特點。上述發現表明，網絡新聞文本雖具有部分商議性特徵，但與公共商議精神要義仍相去甚遠。

關鍵詞：新冠疫苗、公共商議、信息質量

---

Special Issue Article

## **Deliberative Analysis of Online News: A Case Study of Vaccine-Related News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Mainland China**

Ping ZHANG, Xiaoguang YANG, Xiaofan DAI, Yongqi ZENG,  
Ziyang HONG

---

###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text of COVID-19 vaccine news that appear on the Internet in mainland China to identify the deliberation feature of online news reports in a holistic way. Using a mixed research approach, we analyzed the large scale of news reports by topic modeling method and interpreted the result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irst, in terms of inclusiveness, the news text presents the complex dimensions and context of

---

Ping Z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roadcast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edia big data, video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Xiaoguang Y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na Hospit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 health policy, health informatics.

Xiaofan DAI (Associate Chief Officer).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 Interes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Yongqi ZENG (M.A.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Ziyang HONG (B.A. Student). School of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Research interests: game theory, big data resear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3 (2023)

the COVID-19 vaccine, while a large proportion of homogeneous praising texts also damage the diversity of the texts.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ity, business portals take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diffusion but disseminate similar texts. Ordinary people and professional media organiza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central media showed a huge contrast in terms of topic concerns and text frames, which we describe as dissemination with weak communication. Third, from a rational point of view, texts are generally full of emotions, with a sharp polarized contrast of the positive emotions toward domestic issues and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 international ones. The abov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while the online news text has some deliberative characteristics, it is still far from the essence of public deliberation.

**Keywords:** COVID-19 vaccine, public deliberation, information qualit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hang, P., Yang X., Dai X., Zeng Y., & Hong Z. (2023). Deliberative analysis of online news: A case study of vaccine-related news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Mainland Chin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3, 67–100.

## 致謝

本研究得到「部校共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新媒體實驗中心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9YJCZH217)的支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第十五屆傳播學訪問學者計劃工作坊」評議專家以及《傳播與社會學刊》匿名專家、編輯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感謝慧科訊業(北京)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數據支持。

## 前言

互聯網會成為公共商議展開的更有前景的公共領域嗎？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了這一問題的複雜性：部分研究發現了網絡討論的商議性特質 (Dahlberg, 2001; Karlsson, 2012)，部分研究卻發現網絡討論商議效果並不如傳統媒介 (Gerhards & Schäfer, 2010)。不一致的結論固然源於多種影響，但網絡新聞質量問題無疑是其中關鍵因素之一。因為公共商議，「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徵是講理的需要 (reason-giving requirement)，即陳述理由」(古特曼、湯普森，2007：4)，而充分知情是理性講理之先決條件，信息質量因此對公共商議從發起環境、商討過程再到商討結果的全過程均產生重要影響 (Fishkin, 2009; Gudowsky & Bechthold, 2020)。從這一脈絡出發，在網絡公共商議實證研究中，新聞質量問題開始得到研究者的逐漸關注 (Ziegele et al., 2018)。研究發現，新聞報導激發公共討論的能力不一，富有衝突性和影響力的新聞報導容易引發公眾討論 (Bickford, 2011; Weber, 2014)，而新聞報導的框架、語境和情感傾向等不僅會影響評論數量，更影響到評論質量 (Baden & Springer, 2014)。政治主題的新聞報導特別容易引起不文明討論 (Coe, Kenski, & Rains, 2014)，但其報導方式，如對該主題的多層面報導則會增進討論主體的相關知識進而產生商議性的話語 (Rowe, 2015)。簡言之，新聞報導的事實因素和闡釋方式都影響著公共討論的質量 (Ziegele et al., 2020)。

以上研究大多聚焦於某一類型論壇或評論區，關注用戶行為。本文另闢蹊徑從新聞文本是否具有商議性角度關注網絡新聞質量。這一研究視角的獨特價值體現在：第一，經典新聞學理論表明，新聞雖然以事實為核心，但亦是選擇的產物，「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理論」，提示著新聞從業者「什麼存在、發生了什麼、什麼重要」，形成了「選擇、強調和呈現的原則」(舒德森，2010：43-44)。換言之，新聞文本也是一種話語表達，包含和反映了生產主體對於社會各類事務的議題關切和價值取向。從這一意義上講，新聞文本，亦可被視作一種公共商議活動。第二，公共商議理論自提出便一直強調社會各類主體的平等參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與。互聯網造就人人都是新聞記者，不同類型主體以多種形式介入新聞生產並導致海量新聞信息的產生。那麼圍繞著某一重大公共議題，不同類型主體所生產的新聞文本具有什麼特徵、文本之間是否具有勾連以及具有怎樣的勾連、在互聯網上繪製出一幅什麼樣的信息圖景、是否具有商議特點等等，這些重要問題不應被忽略。第三，數字媒介時代人們每天浸潤在新聞的汪洋大海中，這些信息無疑將形塑人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以及自我和集體認同的判斷。如同泰勒所言，新聞報導品質與角色功能，可以深深決定公共辯論的品質與範圍(Taylor & Willis, 1984)。但當下全球各地不同程度出現網絡極化現象嚴重、公共對話難以進行的困境。那麼追根溯源，網絡新聞信息質量究竟如何，能否帶來信息的多樣化？能否提供競爭性的公共意見以便公共討論的展開？這些問題，與公共商議的重要維度——包容性(inclusiveness)(意見的多樣性)具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

對海量網絡新聞文本質量進行總體性考察的困難首先在於文本的獲取、對海量數據的處理和分析能力。近年來興起的計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提供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文本處理與分析工具，為研究提供了實現的可能。在研究對象上，中國大陸——這一全球最為龐大的數字社會，提供了一個生動的研究樣本。在具體議題上，「新冠疫苗」議題關涉面相當多維複雜，集科學性與政治性、經濟性、文化性等各種因素於一體，同時既有全球性又兼具民族性等多種特性，具有大量豐富的新聞文本可供考察。本文嘗試運用計算社會科學方法對中國大陸網絡新冠疫苗新聞文本的商議性進行探索性研究，為全球公共商議研究增加另一種考察維度，同時提供來自中國大陸的經驗參照。

## 文獻綜述

### 網絡公共商議

有學者將公共商議理論劃分為四個代際：第一代著重於規範性、正當性；第二代著重於多元商議，試圖調和規範性與社會現實之間的

張力；第三代則轉向實踐中的探索，進一步修正規範理論並使其得以落地；第四代著重於網絡公共商議研究 (Elstub, Ercan, & Mendonaca, 2016)。網絡公共商議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一是網絡作為公共商議得以開展的工具輔助手段。二是互聯網絡作為深刻的政治價值建構場域，成為公共商議的重要類型。1997年美國之聲首次將計算機技術引入21世紀城鎮會議這一傳統的商議實踐活動，將計算機技術和傳統小組面對面相結合，數千人就複雜公共政策展開公共商討得以可能。其後，網絡技術作為重要輔助手段被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各類公共商議實踐之中，推動形成公共商議活動的大規模化、成本低廉化、運用即時性等特點 (唐慶鵬, 2015)。

Buchstein (1997) 指出，互聯網的普遍性、反階層化、自由互動性等特徵更符合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基本要求，網絡公共商議隨之興起。相關研究基本涵蓋了網絡公共商議實踐的全部：從設計 (如何發起商議) 到過程 (商議過程中的交往質量) 再到結果 (商議是否產生成果) 以及三者之間的互動，其中商議過程中的交往質量——因為涉及公共商議理論的有效性及其對該理論的檢驗問題而為研究者們廣泛關注，並獲得一些突破性進展：一是通過經驗研究進一步引發對規範性理論的反思和修正；二是在內容分析上不斷完善指標構建和引入新手段，從過程到內容進行全方位測量。在前者，多位研究者發現個體化、情感式的修辭表達不僅能夠在某些時機觸發公共商議，而且還能增進商議參與者對彼此境遇的同情性理解，由此拓展了公共商議的可參與人群以及對理性對話的理解。部分研究者則發現消極結果，譬如 Young (2001) 發現，某些討論活動不僅不利於達成同情性的理解，反而進一步產生了極化結果，這一論點在桑斯坦那裡進一步發展為群體極化 (group polarization) 論點，人們往往只接觸與其觀點相符的信息而排斥相左的意見 (Sunstein, 2017)。在後者，因為公共商議的構成要素尚未達成共識，因此產生了基於不同要素的評價體系。商議質量評價體系可歸為兩大類型：對公共商議過程予以總體性分析的宏觀測量及對商談內容進行具體分析的微觀測量。在宏觀測量方面，網絡平台的技術設置、商談主體背景及理性程度、商議程序的設計流程等方面得到研究者較多關注。在微觀測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量方面，運用較為廣泛的主要有：言說行為分析 (speech act analysis)、測量商議內容的編碼方案 (coding scheme for measuring deliberation's content) 及商談質量指標 (the discourse quality index) (黃崢，2014)。

研究發現上呈現出結論不一：有研究發現了網絡論壇言論存在較高水準的商議性，只有少量評論具有攻擊性 (Pieper & Pieper, 2015)，但也有大量學者發現網絡討論充斥不文明、觀點對立甚至謾罵，與公共商議的規範精神相去甚遠 (Quinlan, Shephard, & Paterson, 2015)。不一致的結論固然和平台設計、個人標識可視化等技術手段有關 (Strandberg & Berg, 2015)，但也與商議主體所依據的新聞報導具有密切勾連，新聞的框架、語境和情感傾向等不僅會影響評論數量，更影響到評論質量 (Baden & Springer, 2014)。Ziegele 等人 (2018) 發現，從報導主題看，與公眾生活緊密相關的重大議題更容易激發用戶們的公共商議；另一方面新聞報導中所含有的新聞價值，特別是衝突性、爭議性高的新聞事實將會增進用戶的認知或者觸發其情感，而這兩種類型都可以激發人們參與討論的意願、並影響其商談時的表現。政治性報導容易引發不文明討論 (Coe et al., 2014)，但 Rowe (2015) 發現，對政治性主題的多層面報導則會增進討論主體的相關知識進而產生商議性的話語。簡言之，新聞報導對公共商議具有重要影響，無論是報導主題、新聞內容還是報導方式都影響著公共討論的質量 (Ziegele et al., 2020)。

## 中國大陸公共商議研究

2002年哈貝馬斯在華演講中首次把商議政治思想介紹到中國，同年俞可平在其著述中介紹了商議民主的相關內容 (俞可平，2002)。中共十八大以來，國家層面的政治制度建設推動這一領域成為「顯學」並表現為三個特點：一是結合特有政治制度安排，闡述中國特色的商議與西方國家的不同，提出政黨、人大、政協等制度是公共商議展開的重要渠道，既有大量的理論闡釋研究，亦有豐富的經驗研究，其中，政治商議、國家治理、集體商議、基層治理等是研究者們較為關心的議題 (陳家剛，2006)。二是著重探討政治制度之外的社會性公共商



議，其中新聞傳媒的角色與作用得到不同學科的共同關注，並產生碎片化權威決策2.0 (Mertha, 2009)、公共決策的外壓模式(王紹光, 2006)、政策商議(章平、劉婧婷, 2013)、以信息傳播與溝通為基礎的新型政策方式(Balla, 2012)、公共傳播的商議轉向(胡百精, 2020)等理論觀點。三是網絡公共商議，往往與網絡表達、公共領域、國家治理等相勾連，涉及三個重要面向：從宏觀與定性角度，闡釋網絡商議民主的概念內涵及其機遇挑戰、應對策略(唐慶鵬, 2015)；從政府決策轉型和治理能力角度，關注政府系統與網絡民眾的行為特徵特別是雙方的跨場域互動(李良榮, 2015；章平, 2021)；從實證角度對網絡論壇普通用戶的商議活動進行測量，但相關研究數量較少(不足十篇)，且學者們選取的測量指標差異較大，發現社交論壇充斥偏頗意見，商議質量堪憂(王蕊、周佳、李純清, 2019)。

總體來看，網絡公共商議已為全球各國研究者廣泛關注，歐美研究者開發了不同側重的多種測量指標體系，但研究發現爭論不一，近年來悲觀結論更居主流。因此部分研究者將研究視角轉向新聞信息對於網絡公共商議質量的影響，但大多以網絡用戶為研究對象，聚焦於論壇、聊天室或新聞機構的評論區，採取實驗法、內容分析、問卷調查等方法。在中國大陸，網絡公共商議質量的實證研究較為缺乏。本文以公共商議理論為視角，以中國大陸互聯網上圍繞新冠疫苗的新聞文本為具體分析對象，對網絡新聞文本質量進行總體性考察，為全球公共商議研究增加另一種研究視角，同時充實中國大陸網絡公共商議的實證研究。

爆發於2019年底的新冠疫情是至今仍在延續的重大全球性公共衛生事件，新冠疫苗與之緊密相伴成為國內外各領域學者的熱點研究對象，分別從政府治理、公眾參與、國際關係、疫情防控、醫學免疫等不同學科視角切入，新聞傳播學則聚焦於媒體表現與功能、信息失真與治理、輿論引導與管控、疫苗認知與接種等不同層面。將公共商議和新冠疫情聯結起來討論的研究相對較少，英文論文共三篇，中國大陸未有。三篇英文文獻研究內容均和疫苗接種有關，未見公共商議理論與新冠疫苗新聞報導質量之探討。本研究因此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價值。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 研究問題

Friess與Eilders (2015) 通過對網絡商議研究的系統性梳理，發現包容性、文明性、互動性和理性是衡量公共商議最重要的四個維度。

包容性 (inclusiveness) 這一概念內涵複雜，在和公共商議相聯結時，一方面強調了商議主體具有相同的表達機會，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意見的多樣性 (Manin, 1987)。多樣性無論在公共商議還是新聞學研究中均是一個重要問題。在公共商議領域，它是包容性的重要構成，強調不同類型的人群和不一樣的意見。在新聞學領域，自由而開放的意見市場是新聞媒體的規範性使命，多樣性因此成為新聞實踐的價值追求。麥奎爾 (McQuail, 1992) 在《媒介行為》一書中將多樣性區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如實反映完整的世界，即媒體系統和新聞報導應該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對政治、經濟、文化、信仰等社會中各個領域進行豐富、全面的報導。二是觸達媒體的便捷性，即不同社會主體能夠自由、通達媒體平台並且其意見能夠得以廣泛傳播，特別是批評和反對的聲音。三是多樣化的傳播渠道和內容，以使用戶可以輕鬆獲得各類信息。我們將從兩個層面對包容性進行考察：一是從文本話題、報導主題是否多樣化來考察意見的多樣性；二是從新聞文本生產主體是否多樣化來考察商議主體的多樣性。

文明 (civility) 這一概念通常和人際禮貌規範相關，是社會中最基本的公民態度，展現的「是對於公共利益的善意關心」(Shils, 1992, p. 1)。本文囿於篇幅所限無法對個人評論性文本進行深入研究，故不將文明這一維度納入考察範圍。

互動性 (interactivity) 強調的是商議過程中的交往程度，參與主體之間存在互動是公共商議得以發生的基本邏輯假設。在公共商議理論視域中，互動性強調交往、對話、討論的良性過程，即不同類型主體對他人所傳遞信息和觀點之尊重和討論，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強調主動的表達，同時也強調耐心的傾聽和積極的回應 (Barber, 1984)。換言之，互動性之發生、並得以持續要取決於兩個基礎：參與主體對商議議題及其過程保持連續性的興趣及對其他商議主體持有同情性的理

解。在實證研究中學者 Ziegele 等人 (2018) 把網絡公共商議的互動性指標區分兩個層面：一是對於新聞報導涉及事實的挖掘和補充以及對於新聞內容的轉發、評論，二是對於其他用戶意見的跟帖評論、回應和討論。本文側重於前者，具體以報導主題為核心，考察不同主體新聞文本之間的轉載和呼應程度，特別是對報導主題是否存在不同維度的挖掘和豐富，以此觀看不同主體所產製的文本之間是否具有交互和對話。

理性 (rationality) 是第四個核心維度。從初期對最佳論證的強調，到其後多元理性的提出，再到基於理由的論證，對理性的認識經歷了從規範日益走向實踐的趨勢 (Ziegele et al., 2018)。在基於理由的論證中，商談主體以何種姿態以及如何參與討論是極其重要的，前者強調的是在商討過程中所秉持的價值立場，後者強調的是在商議過程中的充分論據 (許紀霖, 2005)。經驗性或邏輯性資料都可作為論據，但只有基於事實、客觀中立的論述才更有可能成為論據 (Friess & Eilders, 2015)。在這一脈絡下，公共理性與新聞專業倫理規範不約而同走到了一起，因為「新聞唯一需要迎合的就是事實」(Heikkilä & Kunelius, 1998, p. 78)。另外，公共理性追求共同的善，儘管未必達成共識，但至少能對其他商議主體達成同情性的理解，而這一目標之前提取決於商談主體對討論話題所涉及知識的充分理解，於新聞報導而言，「只有客觀、中立、可被理解的新聞才有可能被轉化為知識」(Urban & Schweiger, 2014, p. 14)。基於以上兩點，本文將從情感這一角度考察文本的理性程度，其基本邏輯在於，中立文本方能提供客觀事實，而正面、負面情緒文本都帶有傾向性，對商議主體的客觀認知和理解造成干擾。事實上，在公共商議的實踐和研究中，研究者們都對商談主體所獲得信息的客觀、中立予以一再強調，因此我們認為文本情感上的客觀中立才能被視為符合理性。另外，鑒於近年來新聞行業所出現的情感轉向，以及部分經驗研究發現情感化表達對於公共商議的複雜作用，我們還將深入考察本研究對象情感的具體特質及其成因。

具體而言，本文將從以下三個維度進行深入考察：(一) 新冠疫苗新聞文本的包容性如何？我們將從意見的多樣性和生產主體的多樣性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兩個層面進行考察。在意見的多樣性方面，從文本數量、新聞話題、報導主題等三個層面挖掘；在生產主體的多樣性方面，將新聞文本的生產主體區分為五種類型，分別考察其在新冠疫苗新聞文本生產與傳播中的表現。（二）新冠疫苗新聞文本的互動性如何？我們將聚焦於五類生產主體，考察其所生產的新聞信息之間是否存在勾連以及勾連是如何發生的。（三）新冠疫苗新聞文本的理性程度如何？我們將情感區分為正面、負面與中立等三種類型，並深入探究文本情感特質及其成因。

## 研究方法

### 研究對象

本文以中國大陸網絡新冠疫苗新聞文本（文字類，不包括視頻）為研究對象。「新冠疫苗」與公共商議的核心要義相契合：一是作為公共事務的重大性。新冠疫情是一個關涉全球各國的重大公共議題，疫苗是決定疫情能否得以控制的關鍵因素。二是牽涉的利益主體多元。新冠疫苗涉及的利益主體眾多複雜，政府部門、科研醫學、生物公司、普通民眾、各類行業組織等不同群體。三是涉及領域極其多樣複雜，商議展開的維度也因此多樣化。疫苗是一個科學問題，但又不限於科學範疇，而是關涉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層面。研究時段上，選取了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6月30日這一關鍵話語時刻：首先，是疫苗研發的重要時期，涵蓋了啟動、試驗及初步成功等關鍵階段；其次，是人們對疫苗認知的重要基礎時期，涉及大量知識、觀點、意見的發布與傳播；再次，大事頻發，文本數量巨大，足以支撐本研究的開展；最後，疫苗研發和生產是生物科技中的高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崛起之路被賦以「技術民族主義」之名（沈辛成，2022：27），那麼「技術民族主義」又將如何影響疫苗報導？

## 研究方法

### I. 數據獲取與清洗

本文數據來源是慧科搜索新聞研究資料庫，該庫收錄大陸地區1,000多種平面媒體和6,000餘種網站新聞，實時、全面抓取公開出版的新聞信息。以「新冠疫苗」為關鍵詞在庫內檢索，獲取研究時段的全部文本，共計619,297條。在數據清洗上，確定了與疫苗相關71個關鍵詞，經反覆測試與評估，將以下文本納入研究範疇：標題中出現關鍵詞或關鍵詞在正文出現2次及以上，或關鍵詞長度佔正文總長度比重大於0.50%。最後獲得數據共494,089條，作為分析數據集。以jiebaR軟件，對文本進行分詞，並遵循文本挖掘規範做法，去除數字、標點、英文字元、中文停用詞等，構成分析用語料庫。

### II. 新聞文本生產主體分類

將生產主體分為專業媒體機構、政府部門、商業門戶網站、機構自媒體與社交媒體五種類型，五種類型既是傳播渠道也是新聞文本的產製主體。專業媒體機構指由國家網信辦認定、具有採訪資質的組織。政府部門指在互聯網上開設網站的行政機構。商業門戶網站指提供綜合性網絡信息服務的商業性組織，今日頭條等聚合性網站歸入此類。機構自媒體指除專業媒體機構、商業門戶網站之外、以機構身份進行信息生產與傳播的主體。自媒體這一概念指代互聯網絡信息內容生產者，但在中國語境中卻側重強調創業者用新技術進行商業活動（于紅梅，2017），因此我們稱其為機構自媒體以突顯其商業特質。普通民眾分散於各個網絡平台，以微博——大陸最為重要的民間意見廣場（李良榮，2015）作為普通民眾的代表。最終主體分布如下：喉舌類媒體658家、市場化媒體328家、行業對象性媒體27家；政府部門網站293個；機構類自媒體1,151個；商業門戶網站266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 III. 權重詞提取法

與高頻詞相比，詞頻—逆文檔頻率(TF-IDF)加權值能夠更好反映出特定詞語在該文中的重要性。通過計算分詞後新聞詞語的權重值，篩選出高頻關鍵字。

### IV. 情感分析

本文採取慧科給定的文本情感判定。作為一家以提供新聞大數據為主營業務且領先的專業公司，其數據質量口碑良好，為眾多研究者採納。其情感判定方法為：基於Wisers AI Lab積累的13萬行業特徵樣本數據，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深度學習神經網絡訓練模型等方法，將情感區分為正面、中性、負面三類。

### V. 主題模型構建

主題模型(topic model)是本文核心分析策略。我們選取結構主題模型(structural topic model, 簡稱STM) (Roberts, Stewart & Tingley, 2019)作為建模工具，通過模型擬合獲取關於主題分布的若干重要指標：包括語料庫中不同主題的重要性顯示度值、每個主題的關鍵詞及其概率，以及每篇文檔在特定主題上的傾向性值。

建模過程中，區分兩類文本：微博新聞文本與其他新聞文本，因為兩類新聞在長度上存在較大差異，如整體使用將會影響建模效果。就非微博數據來說，因為存在大量重複性文本，先進行去重處理。具體為：以標題中出現任意一個關鍵字的新聞報導作為種子文本，並通過文本jaccorb距離相似度的方法，獲取數據集中正文與種子文本的相似度值，剔除與種子文本相似度值大於0.90的報導，形成非微博數據集共97,127條。微博數據不存在大範圍重複問題，僅進行相關度的篩選，最終納入分析的數據共計37,367條。兩類文本分別進行主題建模。

具體建模過程包括：1.通過無監督方法，設定主題數量選取範圍(25–75)，分別構建主題模型；2.根據semantic coherence指標值(越高說明聚類效果越好)，結合人工交叉判定並經信度檢驗(0.92)，確定主題數量為59個；3.在59個主題中，人工交叉判定並經過信度檢驗



(0.89)，選取20個與疫苗直接相關的主題，計算出主題顯示度值(topic prevalence)、關鍵詞及其比值、文檔主題傾向性值(proportion of document allocated to topic)等重要信息；4.在審視關鍵詞、代表性文檔等基礎上，對20個主題進行命名，並歸入七個大類。數據處理、分析及做表製圖均採用R語言及其工具包實現。

## 研究發現

新冠疫苗新聞文本的包容性如何？

### I. 新冠疫苗的文本數量分布

研究時段內新聞總量近五十萬條、平均每天近三千條的文本量說明這一問題得到了廣泛關注。從時間分布看，1、2月份文本總量較少，但此後每個月均超過十萬篇，每天發文量超過四千條。各類主體對新冠疫苗問題予以了不同程度的關注，多類主體的共同關注帶來傳播渠道的多樣化，用戶的信息獲得較為便捷，同時在規範意義上意味著該問題所涉及的豐富面向能夠得以呈現，因為「新聞的絕對數量應該有助接收者通過使用多個來源獲得對某個主題的公平概述」(Urban & Schweiger, 2014, p. 822)。但龐大新聞數量能否帶來不同消息來源及對新冠疫苗問題的豐富呈現？接下來我們通過報導話題和報導主題的發掘，進一步考察這一問題。需要注意的是，去重後文本總量大幅下降，從近五十萬劇降至97,127篇，降幅高達89%。

### II. 新冠疫苗的話題抽取

權重詞提取方法可以有效分析新冠疫苗新聞文本的話題特徵。權重詞涵蓋領域廣泛，包括國際政治(美國、特朗普)、經濟(公司)、科學(病毒、臨床試驗)、社會(志願者)、動態(確診病例、進度)等不同層面，總體上反映出疫苗新聞文本所涉及的話題包含多種面向，呈現了新冠疫苗問題豐富多樣的維度。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我們進一步探測新聞話題在不同時期的變化(見表一)。總體為兩個特點：一是對疫苗研發進度及其試驗結果的持續關注，二是對歐美國家的持續關切。報導話題覆蓋了科學、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不同領域，較為完整地呈現了新冠疫苗的複雜維度，疫苗研發、國際報導等話題一直持續。那麼圍繞新冠疫苗問題通過哪些具體報導主題得以呈現？哪些主題得以突顯？哪些被忽略了？

表一 不同時期新冠疫苗權重詞的排序情況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新型冠狀病毒	口服	志願者	志願者	美國	生物
捐贈	酵母	重組	滅活疫苗	特朗普	新冠滅活疫苗
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	陳薇院士	美國	公司	公司
集團	教授	陳薇	蓋茨	加拿大	美國
武漢	蛋白	美國	疫苗	口罩	臨床試驗
毒株	公司	武漢	張文宏	疫苗	確診病例
支持	病毒	病毒	臨床試驗	抗體	疫苗接種
冠狀病毒	疫苗	注射	武漢	結果	北京
分離	樣品	小米	生物	疫情	疫苗
科研機構	學院	臨床試驗	確診病例	試驗	抗體
疫苗研發	發出	研製	接種	世界	秋天

### III. 新冠疫苗的報導主題聚類

主題模型(表二)顯示了七個大類主題、20個子主題聚類結果。七個大類主題分別為：疫苗科研(強調疫苗研發的學術性，內容側重科學研究，報導對象往往是科研機構)；疫苗研發(強調疫苗研發的應用性，報導對象往往和醫藥公司有關，包括產學研一體化)；政務發布(行政官方為發布主體，來自政府的信息發布)；抗疫表揚(標題中帶有強烈正面情感，這一類文本數量巨大，故單獨作為一個主題大類)；疫情進展(新冠疫情的動態信息)；國際報導(除中國大陸之外的新聞)；疫苗科普(對免疫原理知識進行大眾化解釋)。

網絡新聞文本公共商議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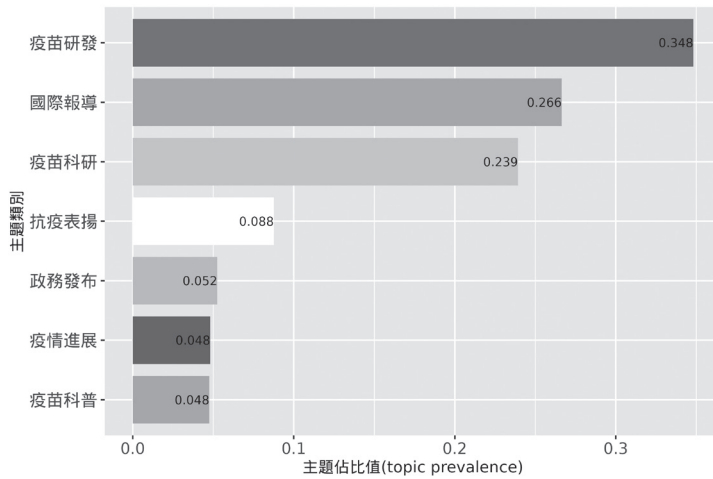
表二 主題模型聚類結果

主題大類	主題類別/名稱	典型關鍵字	代表性新聞標題
政務發布	政府信息發布	新聞發布會、科技部、國務院 聯防聯控機制	國家衛健委：部分新冠疫苗有望4月進行臨床或應急使用
抗疫表揚	疫苗相關表揚	解決、好消息、戰勝、成功、 大國	好！新冠疫苗終於研製成功！！
疫情進展	疫情進展情況	境外輸入、疑似病例、出院、 無新增	浙江無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疫苗科研 (學術)	疫苗專業研究	抗原、基因、表達、口服、蛋白	天大教授回應研發出新冠病毒口服疫苗：未經臨床驗證
	疫苗臨床試驗	一期、二期、二期臨床試驗、 三期臨床試驗、三期	英國新冠疫苗臨床試驗致死？ 研製疫苗的那些事
	疫苗科研進展	柳葉刀、免疫反應、耐受性、 免疫應答、腺病毒	首個新冠疫苗落地在即？《柳 葉刀》刊發中國疫苗I期臨床試 驗結果
	臨床進展	我國、總數、正式、新冠疫苗 研發	我國新冠疫苗生產臨時應急標 準出台
疫苗研發 (應用)	疫苗生產企業	康希諾生物、康希諾、復星醫 藥、商業化、微生物	復星醫藥聯手德國BioNTech， 啟動新冠疫苗研發戰略合作
	研發速度	疫苗研發、階段、動物試驗、 最快、上市	美新冠疫苗進臨床階段 專家： 太快了，除非更早拿到病毒株
	研發攻關	滅活疫苗、攻關組、路線、科 興、腺病毒載體疫苗	新突破！我國新冠病毒滅活疫 苗獲批進入臨床試驗
	軍科院疫苗相關	軍事醫學研究院、領銜、陳薇 院士、重組	陳薇院士團隊研製的重組新冠 疫苗獲批啟動臨床試驗
	研發臨床試驗	揭盲、程式接種、抗體陽轉 率、兩劑、程式、高滴度	全球首款新冠滅活疫苗受試者 全部產生抗體！
	疫苗試驗志願者	小米、普通人、居民、科技日報	他們注射了新冠疫苗，成為探 路者
	疫苗生產	生產車間、生物安全、國藥集團	新冠疫苗預計今年底或明年初 上市
國際報導	蓋茨相關	蓋茨、基金會、聯盟、比爾、 流行病	蓋茨會捐贈16億美元支援疫苗 接種
	歐洲相關	歐盟、德國、賽諾菲、歐洲	法國藥廠惹眾怒
	特朗普相關	特朗普、白宮、總統、福奇、 愛滋病	特朗普負責疫苗民眾慌了
	國際企業相關	人體試驗、測試、候選疫苗、 強生	世界首例新冠疫苗人體研究發 布
	世衛組織相關	世衛組織、德塞、總幹事、中 方、美方、世衛	世衛組織將推出加速新冠疫苗 研發新方案
疫苗科普	免疫原理解普	免疫系統、免疫力、病原體、 人體	疫情當前，它是人體「軍事防 火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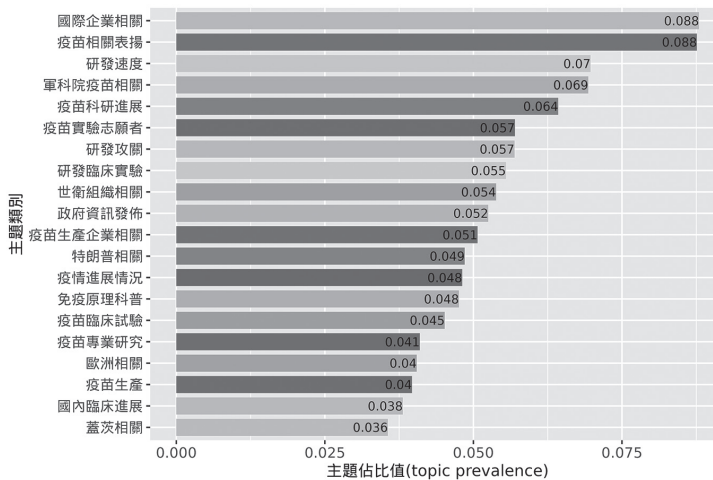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主題顯示度有助於我們更好理解哪些報導主題得到了突顯、哪些主題被忽略。這一方法的獨特價值體現在：(1)可提取每一個文檔與特定主題的關聯程度，由此有效判斷數據集的總體特徵取向。(2)按詞語與主題關聯概率值從大到小排序，研究者可以理解該主題所蘊含的內容。我們對大類主題和子主題分別進行計算，結果見圖一、二。總體表現為兩大特點：

圖一 疫苗報導大類主題顯示度分布圖



圖二 疫苗報導子主題顯示度分布圖



第一，應用性特別是動態信息類主題得以突顯，科學性主題被弱化。動態性信息僅提供了進度情況，所包含的知識含量極其有限，無助於對疫苗複雜面向的深刻理解，因為只有當新聞轉換為知識時才有益於公共商議 (Ziegele et al., 2020)。

第二，表揚性主題的突出位置。在20個子主題顯示度上，表揚性主題位居首位。中國大陸媒體強調宣傳功能和輿論導向，表揚性報導是新聞報導中的常態類型。雖然沒有改變基本事實性內容，但報導可能含有記者的「合理想像」和飽滿情感而損害新聞真實，從而削弱新聞的社會性功能 (陶忠輝, 2020)。另外，表揚性報導的顯示度過大、且表現出上揚的態勢，形成對其他報導主題的擠佔，無疑大大損害了新冠疫苗文本的多樣性。

### 新冠疫苗新聞文本的互動性如何？

文本交往特徵可概括為「傳播力度強、對話性薄弱」。傳播力度強表現為兩點：一是五類主體都對新冠疫苗給予了不同程度的關注，發文數量充沛。二是不同主體之間的轉載、轉發現象突出，新聞報導能夠快速在不同主體間進行流動，形成全社會都在觀看的態勢。特別是對一些重要事件五類主體合力報導，推動報導高峰的形成。對話性薄弱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特點：

#### I. 報導主題偏好：有限交互與高度近似

主題顯示度計算發現，圍繞研發速度，形成有機聯繫並展現出深入挖掘、有來有往的對話性特徵。但大多數子主題卻未能形成多維度挖掘和對話。微博之外的四類主體在主題偏好上高度近似，顯示度重合性較高，報導基調上極為相近，未能形成多維度的報導。國際企業相關、疫苗相關表揚兩類主題構成四類主體最為重要的報導內容。自媒體和門戶網站在國際企業報導中扮演急先鋒，第一時間發布動態消息，同時批評性報導基調貫徹始終，如「由於新冠疫苗利潤不明朗 世界四大製藥廠進展並不順利」、「不可思議！為趕進度，美國藥企研發疫苗竟跳過關鍵環節！」等，得到四類主體的廣泛轉發，共同匯集成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對外批評」之特徵。疫苗表揚主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於疫苗研發重大進展的讚許；二是對在疫苗研發過程中展現的中國實力之讚揚；三是對中國在疫苗研發上的國際合作和貢獻之褒揚。在新冠疫情的防控被提升為衛國之戰並由此體現國家制度優勢的背景下，疫苗研發，就此背負了國家競賽的隱含重任，被視為中國和美國科技競爭的又一重要抓手，從這一脈絡出發，對國際企業的報導是為了反襯中國疫苗研發的巨大勝利，形成「對外批評、對內謳歌」的報導特點。

## II. 常規期的議題分散與高峰期的重複擴散

常規期指的是表三標識出來的九個報導高峰期之外的時期，五類主體報導議題較為分散且存續短暫，總體呈現「各言其說」的特點。報導多為事件性消息，未能在不同主體間形成呼應，也未能形成多角度報導。僅個別文本在不同主體間得以轉發，大多議題僅存續一天。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分散的議題、邊緣的聲音固然可以登場，但是極低的閱讀量卻顯示了其未能得到社會的關注。

報導高峰期(表三)的總體特點為：非政治事件中新聞文本能夠相互呼應，但對政治性事件卻僅局限於單一的轉發擴散，出現大量重複性文本。值得注意的是，高峰期的報導議程基本由中央喉舌類媒體把控。在中國新聞管理制度下，新聞採訪權是一種稀缺資源，門戶網站、自媒體僅有轉載權，這使得專業媒體機構在信息的獲取上獲得了特殊的優勢，特別在信息高度隱晦的實驗室階段，中央喉舌類媒體因其特殊身份在信息獲取上更添優勢。由此形成央媒發布、其他主體轉載擴散的特有景觀。一篇報導被不斷轉載傳播，固然提高了該新聞的影響力，但大量雷同信息意味著新聞內容和形式的極其單一和匱乏，與疫苗問題的多樣性想像相去甚遠，同時也意味著對話性的缺乏。

表三 報導高峰期事件及微博文本佔比比重

日期	事件	微博	非微博
2020-03-18	重組新冠疫苗獲批啟動臨床試驗	8.31%	91.69%
2020-03-22	首批志願者注射重組新冠疫苗	10.80%	89.20%
2020-04-14	新冠滅活疫苗獲批啟動臨床試驗	5.22%	94.78%
2020-04-26	張文宏回應新冠疫苗接種問題	8.77%	91.23%

## 網絡新聞文本公共商議性研究

日期	事件	微博	非微博
2020-05-18	新華社評論文章〈風雨無阻向前進——寫在全國疫情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之際〉	3.65%	96.35%
2020-05-19	習近平在世界衛生大會開幕式宣布中國推進全球抗疫合作五大舉措，疫苗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提供	2.60%	97.40%
2020-05-23	陳薇院士新冠疫苗臨床試驗結果發布	7.19%	92.81%
2020-06-08	6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解答新冠疫苗問題	2.80%	97.20%
2020-06-17	習近平在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上的主旨講話	0.41%	99.59%

### III. 普通民眾之差異表現

微博上的普通民眾，表現出與其他四類主體較大差異。首先在主題顯示度偏好上，普通民眾最為突出的是對於「人」的高度關注，而對於疫苗表揚主題則表現出較低偏好。其次是對高度政治性報導的低關注度。表三顯示，與國家領導人相關事件在微博中均未得到高度關注。最後是對專業媒體機構報導內容的偏移與再加工。即便主題類別與其他主體大致相同，但在關注重點上與其他主體呈現較大差異。社交媒體與其他四類主體在關注點上的差異，一方面說明新聞文本所具有的包容性，社交媒體作為普通民眾的發聲平台有其積極意義，但也反映了「兩個輿論場」（南振中，2003：7）在對話交往上的困境。

### 新冠疫苗新聞文本的理性如何？

數據分析顯示了兩個特點：一是文本情感充沛，二是情感兩極化現象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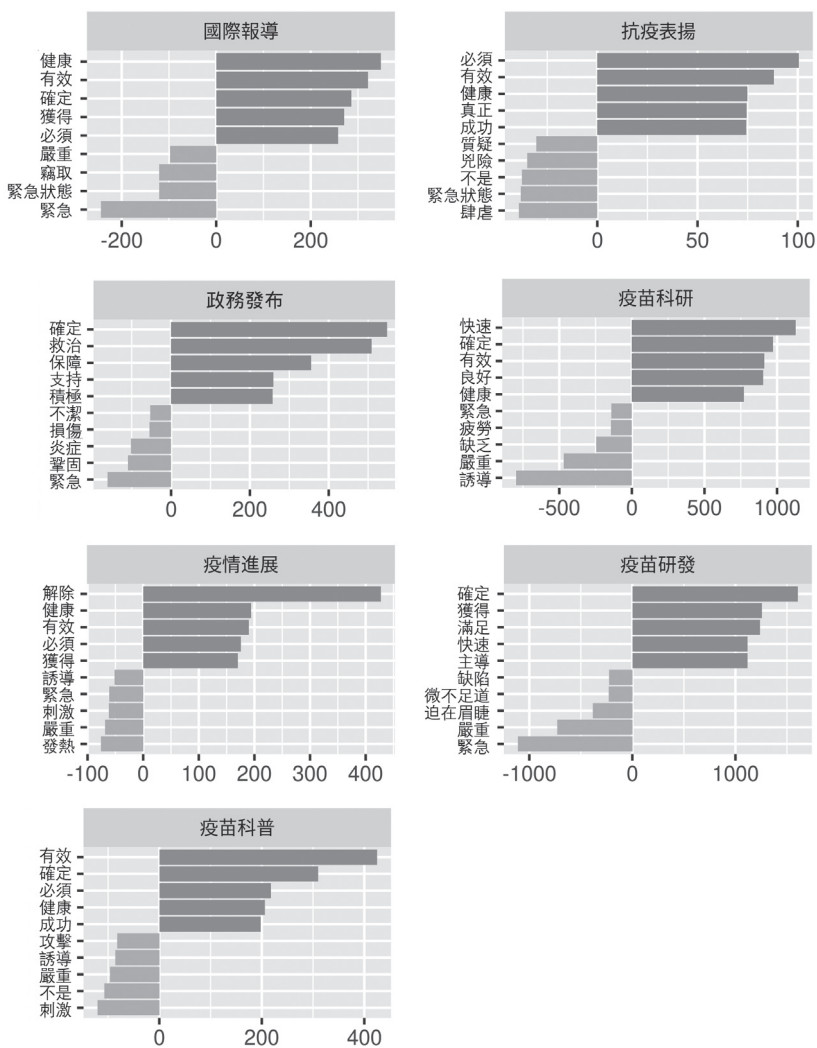
#### I. 文本情感充沛

總體來看，文本情感極為突出，中立文本僅佔13%，正面情感文本比例高達55%，負面情感文本佔比32%。我們從主題大類、子主題類別中分別取前五個正向和負向情感詞（見圖三），以此探測文本情感可能存在的規律。令人注意的是「必須」也成為正向情感的主要聯結詞，與疫苗速度、軍科院、政府決策、領導人活動等緊密相關，顯示出中國政府對於抗擊疫情和保衛國民的堅決態度。同時與中國國情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熱點人物有關，著重於信念的提升。雖然專業人士重在陳述觀點，但媒體卻從積極方面解讀，這使得標題中出現「鍾南山」和「張文宏」的文本中正面情緒的比重分別佔57%和77%。以軍科院為代表的中國研發團隊更是如此，標題中出現「陳薇」的文本，正面情緒佔比高達91%。負面關鍵詞與疫情危急程度相關，也多涉及對於歐美疫情防控措施的批評。

圖三 七個主題大類情感關鍵詞





## II. 情感兩極化現象突出

情感兩極化主要表現在：正面情感與負面情感均佔較大比重，分化現象突出；兩類情感在報導對象上的極化現象突出，形成對內謳歌對外批評之特點。內指的是中國大陸，外指的是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對內謳歌主要是對中國疫情防控和疫苗開發的褒揚，正如《人民日報》總結該報角色是「凝聚起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的強大正能量」（人民日報社新聞協調部，2020：32）。對外批評的主要特點是對歐美疫情防控不利及疫苗開發中問題的披露，以突顯中國優勢。對內謳歌方面，專業媒體機構為其他類型主體奠定報導基調，以三大中央喉舌媒體為代表，態度鮮明、情緒積極。地方黨媒、都市類媒體、行業對象性媒體基本追隨中央黨媒步伐，僅財經類媒體情感面向相對多元：在資金投入、物資支持、臨床試驗等方面持積極正面情感，在疫苗研製動態持客觀、中立表述；在疫情發展、疫苗研製困境、對經濟影響等議題呈現出負面情感。中央黨媒的情感傾向通過其他類型傳播主體的分發轉載，得以進一步擴散。

自媒體、門戶網站則成為對外批評的主力軍，伴以強烈的情緒表達，典型文本如「美國10萬人測試疫苗，結論令華盛頓死一般沉寂，白宮：最黑暗一天」。在中國官方對美姿態日漸強硬的背景下，反美成為賺流量法器，門戶網站、自媒體的商業屬性，使其成為對外批評的急先鋒。對外批評往往涉及歐美國家疫情防控不利及疫苗研發中的問題，表達對歐美疫情發展的普遍擔憂。其中，尤以美國為甚。以「特朗普」為關鍵詞在文本中檢索，顯示61%的文本為負面情感，正面情感僅佔24%。微博是唯一例外，文本情感相對更為中立，與門戶網站和自媒體強烈的反美敘事形成對比。

## 討論

新冠疫苗新聞文本是否具有商議性？經驗資料分析結果展現出這一問題的複雜性。

首先，從包容性這一角度看。雖然從規範意義上講，新聞的絕對數量應該為用戶提供更為多樣化的信息來源，從而有益公共商議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Urban & Schweiger, 2014)，但本文卻發現新聞的絕對數量以及多個信息來源並不意味著對該主題的公平論述，核心表現為無效文本與重複性文本的干擾。從無效文本看，數量高達12萬條，標題中出現「新冠疫苗」而正文卻是廣告，與疫苗問題毫無關係。重複性文本指的是從標題到內容的完全雷同，或者只是標題上的個別改動，比重高達89%。如何看待重複性文本對於公共商議的作用？一方面它可能具有特殊價值，在人們注意力極其有限同時信息負荷超重的網絡空間中，一篇報導被反覆轉載提升了該新聞事件的可見性，提升了其傳播效力。在中國大陸體制內表達空間極其有限的情況下，當重複性文本傳遞的是被封鎖的信息特別是和民眾切身利益有關的公共事件時，該新聞則扮演了突破信息封閉的「火炬手」功能(章平、劉婧婷，2013：69)，引發全社會在線觀看、可能激發公共商議進而促成該事件的解決(唐慶鵬，2015)。但本文中的重複性文本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特徵：一是動態資訊類信息為主。已有實證研究表明，只有當新聞轉換為知識時，才有助於公共商議的展開(Neuberger, 2014)。威廉·詹姆士提出知識的兩種方式：知曉(knowledge of acquaintance)與理解(knowledge-about)(詹姆士，1963)，前者強調的是現象，後者強調的是觀念。在舒德森看來，新聞具有兩種理想模式：信息性新聞和故事性新聞，前者著重於提供以及時性、關注具體差異為核心特徵的知曉層面的知識，後者著重探究隱蔽的事實或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以在提供知曉基礎上協助讀者理解事件(鄭忠明、江作蘇，2016)。網絡進一步放大了對新聞的時間性要求，新聞作為知曉式的知識特性日益突出，從這一脈絡下可理解動態性信息何以成為文本類型的首要構成。知曉式知識並非沒有其意義，因為理解往往由知曉積澱而來，新聞提供了「引人談論之物」的談資並可能引發人們理性思考、從態度和表達中沉澱、提煉出理解(Park, 1955, p. 78)。但是，當網絡上充斥動態性信息、乃至動態性信息已經成為信息負擔時，人們更需要的是應該幫助他們從雜亂的信息中理出頭緒，使之能夠被快速理解的新聞(Ziegele et al., 2020)。另外，需要警惕的是，動態性信息被重複擴散，在客觀上造成了對其他類型新聞的干擾和排斥，同時也增加了用戶獲得其他理解性新聞的難

度。正如本文發現，雖然以丁香園為代表的部分健康類自媒體圍繞疫苗研發刊載了大量分析文章，但閱讀量寥寥。二是多為宣傳性報導。宣傳有廣義與狹義之分，雖然定義不一，但核心包括對符號的操縱以及對被宣傳對象行為產生影響的意圖（劉海龍，2013）。因此宣傳性報導往往帶有強烈的傾向性，服務於黨和政府的大政方針，雖然能夠提供一些事實，但大多在報導者的價值框架內展開。本研究發現宣傳性報導著重於呈現新聞事件的單一維度，特別是突顯報導的政治屬性，由此導致了疫苗相關表揚不僅成為一種重要的主題類型，且這一主題偏好在不同類型傳播主體（除普通民眾之外）中均佔據前三之列。當同一宣傳性文本被不同傳播主體、在不同傳播渠道上反覆被轉載，導致用戶只能接觸到單一信息，從總體上損害了新聞的多樣性，與公共商議所倡導的意見的多樣性精神相去甚遠。

其次，從互動性這一角度看。五類主體所產製的新冠疫苗新聞呈現出傳播力度強、對話性薄弱之特徵，雖然在某些主題上形成交互對話，但為何專業媒體機構、商業門戶網站、機構自媒體以及政府網站在子主題的偏好上驚人地保持一致？這一問題實質指向的是四類主體在從事新冠疫苗新聞報導時所秉持的價值立場為何。在公共商議理論語境中，對話、交流、討論等互動行為之能產生的關鍵邏輯在於商談主體能夠對於討論參與者達成同情性理解。在這一過程中，商議的參與者從什麼立場介入討論是至關重要的：即，是從個體的利益立場出發還是從商談主體可以共用的價值立場出發？在規範性語境下，商談主體得以共用的價值立場通常是公共利益，因為在利益多元化的當下，如果每一個討論者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對話便難以形成，即便通過公共討論，也很難對其他商談主體的利益產生同情性的理解。本文認為，在新冠疫苗這一個案中，新聞文本之所以表現為傳播性強對話性弱的特點，乃在於普通民眾之外的四類主體在其新聞實踐過程中所持有的共同價值立場，即凝聚人心的輿論導向作用。這一價值立場的形成與中國大陸新聞管理制度有關。新聞媒體機構的身份性質首先是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通過日常新聞實踐活動承擔起政策宣傳、凝聚人心以及輿論引導等政治功能。針對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社會中瀰漫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的不確定性情緒，2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要求「宣傳輿論工作要加大力度，統籌網上網下、國內國際、大事小事，更好強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習近平，2020：1)。這一講話精神隨即成為專業媒體機構從事新冠疫情報導的綱領性文件，同樣貫穿於新冠疫苗的報導之中。商業門戶網站和機構自媒體雖然沒有媒體身份，但同樣接受各級政府部門管理，並在一次次網絡專項整治行動中被不斷規訓。與專業媒體機構新聞報導基調保持一致，成為商業門戶網站和機構自媒體的最優選擇。從這一脈絡出發，我們可以理解為何表揚性文本數量巨大，並在子主題顯示度值上佔據第一的顯著位置；同時也可以理解為何中央喉舌類媒體發布的政治性報導能夠在商業門戶網站和機構自媒體上被廣泛轉載，形成傳播力度強但對話性薄弱的特點。因此，即便生產主體是多類型的，但當宣傳與引導成為指導新聞實踐的統一價值立場時，卻未能產生真正有對話意義的新聞文本，顯然與公共商議理論所倡導的尊重多元價值立場、同情性對話等精神要義背道而馳。

第三，從理性角度看。近年來人文社科領域出現一種普遍的「情感轉向」，情感與人類行為、情感與社會秩序、情感與理性等都成為「情感轉向」的重要議題，正是基於此，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理性主義範式遭致越來越廣泛的質疑。學者們一方面提出認知與情感並非二元對立(Nussbaum, 2003)，更有學者強調情感對於公共領域的建設性作用，「公共領域未必僅僅是冷冰冰的話語，激情反而可能給公共領域帶來活力」(楊國斌，2009：54)。儘管克勞斯(Krause, 2015)將理性與情感容納一起考慮並提出「情感性商議」(emotional deliberation)的論點，但情感於公共商議之作用至今仍是一個廣泛爭議的問題，對於「好的情感」與「壞的情感」也並無權威邊界和判斷標準(袁光鋒，2016：108)，因此對於情感與理性之複雜聯繫需要置於研究對象的具體語境中深入考察。在本文中，新冠疫苗新聞文本突出的情感特徵是對內謳歌對外批評的兩極化情緒，特別是表揚性報導充斥其間，成為正面情感文本的重要構成。負面情感文本相對集中於國際報導，特別是有關美國報導。這固然和研究時段內國際疫情迅速惡化有關，但也與新聞報導中

普遍採取的「國力競賽」框架有關，以「新冠疫苗」和「競賽/較量」為關鍵詞、在慧科數據庫內對研究時段進行檢索，共 15,392 篇文章同時出現這兩組關鍵詞。這意味著將新冠疫苗這一極其複雜、具有多維面向的全球性重大公共議題置於民族國家利益範圍內處置，反映了中國大陸在內宣外宣上指導新聞實踐的一貫策略：正面宣傳與負面宣傳並用，前者以鼓舞啟迪為主，後者以揭露敵對弊端為主（童兵，1990）。民族國家利益的訴求通常具有雙向性：一方面從民族國家獨特性出發，強調獨立自主，拒絕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對外部認同和民族榮譽抱有極大關切（梁雪村，2018）。在新冠疫苗這一個案中則具體體現為科技民族主義的訴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和技術引發世界關注並被冠以「技術民族主義」之名，特別是 21 世紀以來中國在電子通信領域快速成長，雖然 2004 年推出意在維護信息主權的無線通信協議標準受挫，但近年來在航空航天領域的巨大成功以及一系列大國重器的出現，令技術民族主義情緒持續高漲。2020 年夏天以來中美科技領域的分歧出現新一輪升級，特別是美國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淨網計劃」以及針對華為公司為首的「數字斬首」行動，初步顯現將中國整體作為目標的特徵，反過來進一步刺激中國大陸的科技民族主義情緒。在新冠疫情的防控被提升為應對社會危機的國際比賽乃至衛國之戰高度的背景下（張薇、汪少華，2020），新冠疫苗這一集合遺傳學、免疫學、有機化學、有機物理、信息技術等多學科為一體的前沿的、新興科技領域，同時作為控制疫情的重要抓手，也因此承載了形成「一種公共的凝聚力」以強化民族認同的重要使命（沈辛成，2022：29）。而中國科學家特別是軍科院在疫苗研發中的優異表現（與美國同一時間宣布啟動疫苗人體試驗）提供了中國在科技領域強起來的實例。科技民族主義固然能夠強化民族自尊心和強化國家認同（3 月 18 日報導數量和報導維度都為研究時段內之最），但對科技民族主義的過於強調可能對科技全球化帶來新一輪反衝，在對內謳歌對外批評的報導基調中則更強調了中國大陸和他國之間的對立，和公共商議所要求的理性精神相去甚遠。

從以上三方面的討論，我們發現，新冠疫苗新聞文本雖然在某些方面呈現了商議性特徵，但是距離公共商議規範性要求仍然存在巨大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距離，因為如果用戶沒有收到客觀的、相關的、可理解的和多樣化的媒體信息，他們就不能成為消息靈通、有能力和積極的公民(Hasebrink, 2011; Meijer, 2001)

## 研究貢獻和研究局限

本文將新聞文本視為一種公共商議活動，創造性地探索以計算傳播研究法對新冠疫苗新聞的公共商議性質進行總體性考察，一方面為網絡公共商議實證研究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同時增加了中國網絡公共商議研究的經驗材料。

由於是探索性研究，本文還存在以下三方面局限：一是，本文著力於從整體性層面考察網絡新聞文本的商議性問題，涉及包容性、互動性及理性等面相，囿於篇幅所限，未能對每個維度給予詳細的操作化定義與指標測量。對五類主體的對比研究，特別是微博和其他四類生產主體在包容性、情感上的對比也未能深入。此外，不同類型媒體之間的對話、交流的分析篇幅比較有限。未來可重點聚焦其中的某一個層面，進行更深入細緻的探討。二是，新冠疫苗雖然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議題，但是也有特定時期、特定議題以及中國這一特殊社會情境所具有的獨特性，由此導致研究發現的解釋範圍受到一定限制。三是，對於理性的分析維度有待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限於篇幅，僅從情感這一維度來度量理性，且將中立文本視為符合理性。後續研究可將價值立場等多種維度一併納入考察。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人民日報社新聞協調部(2020)。〈唱響眾志成城抗擊疫情最強音——人民日報社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報導發揮排頭兵作用〉。《中國報業》，第5期，頁32-35。
- Renmin ribaoshe xinwen xietiaobu (2020). Changxiang zhongzhi chengcheng kangji yiqing zuiqiangyin—Renmin Ribaoshe quanli zuohao yiqing fangkong baodao fahui paitoubing zuoyong. *Zhongguo baoye*, 5, 32-35.

- 于紅梅 (2017)。〈從「We Media」到「自媒體」——對一個概念的知識考古〉。《新聞記者》，第12期，頁49–62。
- Yu Hongmei (2017). Cong 'We Media' dao 'zimeiti'—Dui yige gainian de zhishi kaogu. *Xinwen jizhe*, 12, 49–62.
- 王紹光 (2006)。〈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頁86–99、207。
- Wang Shaoguang (2006). Zhongguo gonggong zhengce yicheng shezhi de moshi. *Zhongguo shehui kexue*, 5, 86–99, 207.
- 王蕊、周佳、李純清 (2019)。〈網絡輿情事件中的協商有效性評估與測量指標建構〉。《當代傳播》，第6期，頁55–58。
- Wang Rui, Zhou Jia, Li Chunqing (2019). Wangluo yuqing shijian zhong de xieshang youxiaoxing pinggu yu celiang zhibiao jiangou. *Dangdai chuanbo*, 6, 55–58.
- 李良榮 (2015)。《新傳播革命》。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Li Liangrong (2015). *Xin chuanbo geming*.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沈辛成 (2022)。〈技術民族主義：源流、局限與前景〉。《探索與爭鳴》，第2期，頁27–37、177。
- Shen Xincheng (2022). Jishu minzu zhuyi: Yuanliu, juxian yu qianjing. *Tansuo yu zhengming*, 2, 27–37, 177.
- 俞可平 (主編) (2002)。《中國地方政府創新200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Yu Keping (Ed.) (2002). *Zhongguo difang zhengfu chuangxin 2002*.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南振中 (2003)。〈把密切聯繫群眾作為改進新聞報導的著力點〉。《中國記者》，第3期，頁6–10。
- Nan Zhenzhong (2003). Ba miqie lianxi qunzhong zuowei gaijin xinwen baodao de zhuoli dian. *Zhongguo jizhe*, 3, 6–10.
- 胡百精 (2020)。〈公共協商與偏好轉換：作為國家和社會治理實驗的公共傳播〉。《新聞與傳播研究》，第4期，頁21–38。
- Hu Baijing (2020). Gonggong xieshang yu pianhao zhuanhuan: Zuowei guojia he shehui zhili shiyan de gonggong chuanbo.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4, 21–38.
- 陳家剛 (2006)。〈生態文明與商議民主〉。《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2期，頁82–86。
- Chen Jiagang (2006). Shengtai wenming yu shangyi minzhu. *Dangdai shijie yu shehui zhuyi*, 2, 82–8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 埃米·古特曼、鄧尼斯·湯普森(2007)。<〈審議民主意味著什麼〉(談火生譯)。談火生(主編)，《審議民主》(pp. 4)。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 Gutmann, A., & Thompson, D. F. [2004]. *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imi Guteman, Dengnisi Tangpusen (2007). Shenyi minzhu yiwei zhe shenme. In Tan Huosheng (Ed.), *Shenyi minzhu*.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Gutmann, A., & Thompson, D. F. [2004]. *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莎倫·R·克勞斯(2015)。<〈公民的激情：道德情感與民主商議〉(譚安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 Krause, S. R. [2008]. *Civil passions. Moral sentiment and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alun R Kelaosi (2015). *Gongmin de jiqing: Daode qinggan yu minzhu shangyi*.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rause, S. R. [2008]. *Civil passions. Moral sentiment and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唐慶鵬(2015)。<〈網絡商議民主的成長軌跡及障礙研究〉。《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5期，頁159–164。
- Tang Qingpeng (2015). Wangluo shangyi minzhu de chengzhang gui ji zhangai yanjiu. *Dangdai shijie yu shehui zhuyi*, 5, 159–164.
- 袁光鋒(2016)。<〈「情」為何物？——反思公共領域研究的理性主義範式〉。《國際新聞界》，第9期，頁104–118。
- Yuan Guangfeng (2016). ‘Qing’ wei he wu?—Fansi gongong lingyu yanjiu de lixing zhuyi fanshi. *Guoji xinwenjie*, 9, 104–118.
- 陶忠輝(2020)。<〈謹防正面宣傳的負面效應——新冠疫情報導多起「輿論翻車」的啟示與反思〉。《新聞前哨》，第12期，頁65–66。
- Tao Zhonghui (2020). Jinfang zhengmian xuanchuan de fumian xiaoying—Xinguan yiqing baodao duoqi ‘yulun fanche’ de qishi yu fansi. *Xinwen qianshao*, 12, 65–66.
- 許紀霖(2005)。<〈北大改革與商議性民主〉。《學海》，第5期，頁42–48。
- Xu Jilin (2005). Beida gaige yu shangyi xing minzhu. *Xuehai*, 5, 42–48.
- 章平、劉婧婷(2013)。<〈公共決策過程中的社會意見表達與政策協商——以新醫改政策制定為例〉。《政治學研究》，第3期，頁57–68。
- Zhang Ping, Liu Jingting (2013). Gonggong juece guocheng zhong de shehui yijian biaoda yu zhengce xieshang—Yi xin yigai zhengce zhiding weili. *Zhengzhixue yanjiu*, 3, 57–68.

- 章平 (2021)。〈協商式吸納——輿論意見如何進入政策過程〉。《學海》，第4期，頁131-141。
- Zhang Ping (2021). Xieshang shi xina—Yulun yijian ruhe jinru zhengce guocheng. *Xuehai*, 4, 131-141.
- 梁雪村 (2018)。〈承認的政治：民族主義為什麼沒有衰落？〉。《國際政治科學》，第4期，頁92-117。
- Liang Xuecun (2018). Chengren de zhengzhi: Minzu zhuyi weishenme meiyoushuailuo? *Guoji zhengzhi kexue*, 4, 92-117.
- 張薇、汪少華 (2020)。〈新冠肺炎疫情報導中刻意隱喻的認知力〉。《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第2期，頁114-127。
- Zhang Wei, Wang Shaohua (2020). Xinguan feiyan yiqing baodao zhong keyi yinyude renzhili. *Tianjin waiguoyu daxue xuebao*, 2, 114-127.
- 習近平 (2020)。〈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時的講話〉。《求是》，第4期，頁1-4。
- Xi Jinping (2020). Zai Zhongyang Zhengzhiju Changweihui Huiyi yanjiu yingduixinxing guan Zhuang bingdu feiyan yiqing gongzuo shi de jianghua. *Qiu Shi*, 4, 1-4.
- 童兵 (1990)。〈表揚性報導、批評性報導和以正面宣傳為主〉。《新聞與寫作》，第6期，頁9-10。
- Tong Bing (1990). Biaoyang xing baodao, piping xing baodao he yi zhengmian xuanchuan weizhu. *Xinwen yu xiezu*, 6, 9-10.
- 舒德森 (2010)。《新聞社會學》(徐桂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原書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W.W. Norton & Company.)
- Shudesen (2010). *Xinwen shehui xue* (Xu Guiquan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W.W. Norton & Company.)
- 黃崢 (2014)。〈商議質量的指標化——商談測量工具綜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15-21。
- Huang Zheng (2014). Shangyi zhiliang de zhibiao hua—Shangtan celiang gongzuzongshu. *Beijing hangkong hangti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ban)*, 2, 15-21.
- 詹姆士 (1963)。《心理學原理》(唐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 Zhanmushi (1963). *Xinlixue yuanli* (Tang Yue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 楊國斌 (2009)。〈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傳播與社會學刊》，第9期，頁39–66。
- Yang Guobin (2009). *Beiqing yu xixue: Wangluo shijian zhong de qinggan dongyu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9, 39–66.
- 鄭忠明、江作蘇 (2016)。〈作為知識的新聞：知識特性和建構空間——重思新聞業的邊界問題〉。《國際新聞界》，第4期，頁142–156。
- Zheng Zhongming, Jiang Zuosu (2016). *Zuowei zhishi de xinwen: Zhishi texing he jiangou kongjian—Chongsi xinwenye de bianjie wenti. Guoji xinwenjie*, 4, 142–156.
- 劉海龍 (2013)。《宣傳：觀念，話語及其正當化》。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Liu Hailong (2013). *Xuanchuan: Guannian, huayu jiqi zhengdanghua*. Beijing: Zhongguo da baike quanshu chubanshe.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aden, C., & Springer, N. (2014). Complementing the news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contribution of news users' commentary to the diversity of viewpoints in the public debat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5), 529–548.
- Balla, S. J. (201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policymak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76), 655–673.
- Barber, B. (1984).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ickford, S. (2011). Emotion talk and political judg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3(4), 1025–1037.
- Buchstein, H. (1997). Bytes that bite: The Internet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4(2), 248–263.
- Coe, K., Kenski, K., & Rains, S. A. (2014). Online and uncivi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incivility in newspaper website comm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4), 658–679.
- Dahlberg, L. (2001). The Internet and democratic discourse: Exploring the prospects of online deliberative forums extending the public sphe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4), 615–633.
- Elstub, S., Ercan, S., & Mendonaca, R. F. (2016).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10(2), 139–151.
- Fishkin, J. S. (2009). *When the people spea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iess, D., & Eilders, C. (2015). A systematic review of online deliberation research. *Policy & Internet*, 7(3), 319–339.

- Gerhards, J., & Schäfer, M. S. (2010). Is the internet a better public sphere? Comparing old and new media in the USA and Germany. *New Media & Society, 12*(1), 143–160.
- Gudowsky, N., & Bechtold, U. (2020).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9*(1), 1–35.
- Hasebrink, U. (2011). Giving the audience a voice: The role of research in making media regulation more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 1*, 321–336.
- Heikkilä, H., & Kunelius, R. (1998). Access, dialogue, deliberation: Experimenting with three concepts of journalism criticism. *Nordicom Review, 19*(1), 71–84.
- Karlsson, M. (2012). Understanding divergent patterns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online forums—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citizens’ consultation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9*(1), 64–81.
- Manin, B. (1987). On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deliberation. *Political Theory, 15*(3), 338–368.
- McQuail, D. (1992). *Media performa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Vol. 144). London: Sage.
- Meijer, I. C. (2001). The public quality of popular journalism: Developing a normative framework. *Journalism Studies, 2*(2), 189–205.
- Mertha, A. (2009).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 Political plu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 200*, 995–1012.
- Neuberger, C. (2014). The journalistic quality of internet formats and services. *Digital Journalism, 2*(3), 419–433.
- Nussbaum, M. C. (2003).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k, R. E. (1955). *Society: Collective behavior, news and opinion, sociology and modern socie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 Pieper, A. K., & Pieper, M. (201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via social media: A case study of deliberative quality in the public online budgeting process of Frankfurt/Main, Germany 2013. *Universal Acces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4*(4), 1–17.
- Quinlan, S., Shephard, M., & Paterson, L. (2015). Online discussion and the 2014 Scottish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Flaming keyboards or forums of deliberation? *Electoral Studies, 38*, 192–205.
- Roberts, M. E., Stewart, B. M., & Tingley, D. (2019). STM: An R package for structural topic model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91*(2), 1–40.
- Rowe, I. (2015). Civility 2.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civility in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2), 121–138.
- Shils, E. (1992). Civility and civil society. In E. C. Banfield (Ed.), *Civility and citizenship in liberal democratic societies*. (pp. 1-15). New York: Paragon Hous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 Strandberg, K., & Berg, J. (2015). Impact of temporality and identifiability in online deliberations on discussion quality: An experimental study. *Javnost-The Public*, 22(2), 164–180.
- Sunstein, C. R. (2017).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L., & Willis, A. (1984). *Media studies: Texts, institutions and audiences*.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 Urban, J., & Schweiger, W. (2014). News quality from the recipients' perspective: Investigating recipients' ability to judge the normative quality of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15(6), 821–840.
- Weber, P. (2014). Discussions in the comments section: Factors influencing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vity in online newspapers' reader comments. *New Media & Society*, 16(6), 941–957.
- Young, I. M. (2001). Activist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Theory*, 29(5), 670–690.
- Ziegele, M., Weber, M., Quiring, O., & Breiner, T. (2018). The dynamics of online news discussions: Effects of news articles and reader comments on users' involvement,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the civility of their contribu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10), 1419–1435.
- Ziegele, M., Quiring, O., Esau, K., & Friess, D. (2020). Linking news value theory with online deliberation: How news factors and illustration factors in news articles affect the deliberative quality of user discussions in SNS' comment sec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7(6), 860–890.

## 本文引用格式

章平、楊肖光、戴笑凡、曾詠祺、洪子陽 (2023)。〈網絡新聞文本公共商議性研究——以新冠疫情初期中國大陸相關報導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3期，頁67–100。